

學術期刊、學術評價 與學術共同體的良性互生

張桃洲

[提 要] 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因受到內外因素的影響,在與學術評價、學術研究的對話交流中並未形成良好的學術共同體,甚至出現相互疏離與悖反,深刻地影響了學術生態環境的建設。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在正確理解學術期刊定位、學術評價對學術期刊引導性質的基礎上,激發學術期刊參與學術評價的積極性,探尋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的有機關聯及二者基於雙向主體性的對話和互動空間,由此共同參與一種良性學術共同體的構建。

[關鍵詞] 學術期刊 學術評價 學術共同體 良性互生

[中圖分類號] G23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129 - 11

本文討論的學術期刊是指綜合類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其中主要涉及高校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綜合學術期刊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和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乃至教育事業的進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與專業期刊相比,綜合學術期刊在辦刊中面臨更多困難,尤其就高校學報來說,它既要考慮綜合期刊的一般特點,又受制於高校的地位、學術力量、學科分布以及各種政策、條件等因素。在世紀之交,高校學報受到“一校一刊”政策的影響,在辦刊數量上得到急劇擴容,但由於自我定位的模糊、優質稿源的流失以及讀者的相對匱乏,導致其在學術期刊中的聲譽漸趨下降,備受廣大學者的指責。雖然教育部在 2003 年推出“名刊工程”(“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致力於提升學報的發展態勢,為其在新形勢下的自我革新與發展轉型提供積極平台,但因學術評價、學術研究與學術共同體建設中存在較多問題,自然也影響着高校學報自身的探索與發展,使其在發展定位、欄目革新以及學科視野拓展等方面產生困境。針對這些問題,已有學者從期刊發展、評價機構與行為、學術共同體建設等角度做過分析研究,並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諸如許紀霖的“建立以學術共同體為主體的內在價值尺度和評價機制”、朱劍的“特色專欄、刊際聯合”、劉京希的“以主打欄目為核心的‘歸核化’經營”等^①,但在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共同體三者之間關係的思考上仍存在進一步討論的空間,這成為本文寫作的出發點。

當然,上述問題並非高校學報獨自面對的問題,而是以其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在發展過程中遭遇到的普遍困境。筆者所在的《首都師範大學學報》近年來組織過兩次關於綜合期刊發展的專

門討論,主題分別為“學術評價與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發展”^②與“社科期刊發展與學術共同體構建”^③,邀請了張耀銘、朱劍、王澤龍、仲偉民、蔣重躍、原祖傑等專家學者參與討論。他們針對當前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學術期刊)建設中出現的評價異化、定位模糊、創新不足等問題,提出許多富有啟發性、建設性的見解,也為筆者的思考提供諸多啟發。總體而言,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在其漫長發展歷程中,因受到內外因素的影響,在與學術評價、學術研究的對話交流中並未形成良好的學術共同體,甚至出現相互的疏離與悖反,深刻地影響了學術生態環境的建設。那麼,如何在新的時代語境下處理好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的內在關聯?怎樣建造聚合融通、良性互生的學術共同體?解決好這些關鍵問題成為本文寫作的核心。

一、綜合學術期刊的自我定位

從1906年6月創辦的中國第一份學報《東吳月報》(創刊號名為《學桴》)開始,高校學報就頗為重視自身的定位問題,因為這是決定其辦刊立場、價值觀念、精神姿勢的主體要素,深度參與着學術共同體的建設。該學報將“西士謀刊行月報,以表學堂之內容,與當代學界交換知識”作為辦刊宗旨,意在強調學校教育和學術交流的重要性,使其在現代學術建立初期發揮了理念認知與學術引導的關鍵作用。與《東吳學報》相比,創刊於1915年12月的《清華學報》更加明確了學術期刊的高校主辦屬性,發刊詞提出“闡發學理,傳播學術;集思廣益,以資考鏡;互相交換,互相觀摩;博通古今,融貫中西”的辦刊宗旨,不僅體現了鮮明的學術傳播定位,強調“交換”與“觀摩”的交際理念,而且還有着“古今”與“中西”的宏闊視野,表現出世界性的目光與佔位,有力地提升了現代學術的社會參與度,促進學報對現代中國的發展產生社會性的認知。同時期值得關注的還有1919年1月創刊的《北京大學月刊》,有學者認為該刊物是“中國自己創辦的最具典型意義和最富大學學報形態及特徵的學術刊物”^④,足以見得它在現代學術期刊中的歷史地位。《北京大學月刊》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是學術研究與思想交流的平台,而且也作為提升高校辦學水平的重要載體,為促進現代教育的發展提出許多富於建設性的理念。同時,該刊也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推廣新文化、傳播新思想的重要陣地,積極地推動了現代學術及現代思想的轉型。

從上述關於三份中國早期學報定位的分析可得知,傳播學術理念、探討學術問題、促進學術交流是高校學報發展的核心要素。但在隨後的發展歷程中,由於受到行政權力、經濟利益、文化體制等因素的影響,高校學報並未堅守住最初的定位,在某些時期出現思想減弱、交流不暢、探索停滯等問題。直至當下,諸如單純重視量化的“以刊評文”、學術評價體系的片面僵化等現象,都在不斷衝擊着高校學報的健康發展,引發學者的指責與批評,如朱劍發出“高校綜合性學報向何處去”的質問,呼籲學報在高校專業化期刊建設體系中發揮主體作用^⑤。究其根本,這些不良發展趨向的產生與高校學報定位的不明確或是對定位的忽視相關聯。我們可以把高校學報的自我定位理解為飽含着崇高理想與激昂熱情的“初心”,如果在發展建設中忽視自我定位,就會不斷偏離初心,逐步淪為利益交換的工具。

從欄目設置上看,多學科的欄目構成是闡釋綜合學術期刊之綜合性的主要維度,這也是區別於專業期刊的重要標誌。但這種“多學科”的屬性往往是導致趨同化、雜糅化、拼盤化的因素,使得綜合學術期刊在內容編排與欄目設置上似乎呈現同樣的面孔。張耀銘指出:“大家一味走‘泛綜合化的路子’,文學、史學、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面面俱到,眾刊一面,使讀者失去了新鮮感和閱讀興趣。”^⑥既然名為“綜合學術期刊”,其本身就不能為了單純追求社會影響、保持“核心期

刊”行列,通過漠視冷門學科研究、摒棄小眾欄目等形式,去模糊自身與專業期刊之間的界限。多學科仍舊應該作為綜合學術期刊持續堅守的定位,只不過在發展過程中要重視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互動,使其形成交叉性、融合性的研究視野,將學科之“多種”變為研究思想之多元、研究方法之多樣。具體而言,綜合學術期刊可以通過調整欄目結構、做好重點欄目、重視交叉學科等方式,不斷提升自身的綜合性,建構個性化的辦刊特色。在此意義上,劉京希提出的“以主打欄目為核心的‘歸核化經營’”為解決綜合學術期刊的欄目設置困境提供了有力的借鑑,他對此解釋道:“本人主張進行以主打欄目為核心的‘歸核化’經營,即構建以主打欄目為軸心的同心多元體系,形成圍繞‘同心圓’之圓點的集束簇及其向心力,從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與個性化定位。而在概念範疇上,則可以將‘同心多元體系’、‘歸核化經營’、‘專題設計集束簇’視為衡量綜合性學術期刊有機化辦刊程度的概念性工具。”^⑦可以看到,“歸核化經營”的實質就是通過做好刊物的主打欄目,處理好專業眼光與綜合視野之間的內在關係,以主打欄目作為辦刊核心,不斷產生輻射力與傳播力。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近幾年的欄目建設逐步形成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視野,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信用研究”欄目。信用及其相關的理論命題在當今社會的發展中佔據愈加顯著的位置,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領域均表現出對信用問題的重視。基於此,該欄目成為敝刊強調學科融合的主打欄目,儘管其主體內核更多地指向經濟社會中的信用問題,但現代社會發展的綜合性與多樣性使得“信用”的概念內涵在不斷擴展。目前來看,包括政治學、法學、文化學等學科,均納入本欄目的選題視野之內。比如李亭慧與李紅勃的《周代誠信審判及其當代啟示》(2021年第2期)和武林傑的《傳統誠信文化的傳承創新研究》(2023年第5期)兩篇文章,把傳統中國的誠信精神與誠信文化建設作為可供借鑑的文化資源,重點發掘出其對當下社會誠信建設提供的重要啟示。劉菁和楊柳的《誠信文化建設略論》(2022年第3期)則探討了社會文化建設中的信用問題。該文着眼於當前中國誠信文化建設中的現實困境,重點闡述與分析了誠信文化的概念和功能,總結出誠信文化建設的內核,並提出誠信文化建設的路徑。此外,“國際中文教育研究”欄目積極回應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號召,自2022年設立以來,已刊發研究論文18篇(截至2024年第3期)。欄目主要將目光聚焦於國際中文教育這一研究領域,重點關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國際中文教育的理論依據與發展路徑探究、技術在語言教育中的運用以及教材視野中的中華文化塑造等問題,呈現出學科交叉的理論視野和知識融合的思維方式。

上述欄目作為敝刊的主打欄目,一方面意在運用綜合性、交叉性的研究視野,拓展學術研究(特別是研究方法)的邊界,重新激活趨於固化與封閉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則試圖通過學科間的對話與互動,增強學術研究之間的交流,喚起學者內心的樸素情感。如王澤龍所言:“學報利用學科優勢吸納優質稿件,學科藉助學報平台擴展學術影響,形成良性互動互補,優勢學科欄目要成為刊物亮點和特色。刊物的學術平台不能搞小而全,要搞高大上、少而精,形成品牌、名牌。”^⑧這同時回應了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的定位問題,意在通過實現學報與學科之間的良性互動,促進學術期刊平台與學科建設發展的融合貫通。

二、學術評價對學術期刊的引導

當前,學術評價越來越受到重視,這些年人們談論較多的話題之一即“探索中國特色學術評價”。那麼,何為“中國特色學術評價”?期刊界、學術界的許多專家學者和各大學術評價機構紛紛對此進行探索和討論。顯然,不同的學術評價在方式、標準和指標體系等方面呈現出較大的差異

性,也即在對學術期刊的導向上發揮着不同的功能。這裡以國內學界公認的“三大核心期刊”為例,談一談學術評價對學術期刊的引導作用及其不足。

中國最早的關於期刊的學術評價是 1992 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也即當前學術評價中的“北大核心期刊”。該評價體系涵蓋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幾乎囊括現存所有學科門類,在學術評價中得到廣泛使用。在具體遴選方法上,“北大核心期刊”是“根據文獻計量學的定理和方法,以提供學術期刊的優化利用為目的而展開核心期刊研製的,所用的指標比較多,使用的統計源數據庫也較多(2008 版為 81 種),研製過程比較複雜,定性評價中專家評審所佔的比重相對較大,重視綜合性核心期刊的遴選。”^⑨其對學術期刊的引導主要體現在論文的使用率、學術影響等數據上,更多地是對文獻計量學方法的實際運用,但並未涉及論文自身的學術水平,所以不能保證刊登在“北大核心期刊”上的論文都是高水平的論文,這也內在地詮釋出當前“以刊評文”的認知缺陷。而葉繼元與袁曦臨在闡釋核心期刊的“三大功能”時,“為圖書情報部門選購期刊提供參考依據”和“為圖書館員指導讀者閱讀提供參考依據”即佔據前兩個主要功能,最後一個功能才是“為科研管理部門的學術成果評價提供參考”。^⑩我們從功能比重上也可以看出“北大核心期刊”更多地是為圖書情報部門和圖書館員服務,在科研管理部門評價學術成果的過程中只是提供參考,所以完全以“北大核心期刊”來評價學術成果的質量就顯出局限性。

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推出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也即“CSSCI 來源期刊”或“南大核心”),是當前得到廣泛使用的另一大評價體系。與《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相比,該評價體系的範圍主要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將傳統的索引系統轉變為基於引文角度編製的人文社科文獻檢索系統,通過引文分析的方式關注最新的研究動態和理論前沿,尤其注意到邊緣學科、交叉學科和綜合學科的發展狀況。從遴選方法上看,“南大核心”重視“他引影響因子”與“總被引頻次”等指標,參考專家意見最終認定,所以在學術評價層面也屬於以數據為核心的評價體系,並沒有直接建立刊發論文的質量評價標準。尤其就“他引率”來說,由於人文學科的研究及社會學科研究之間存在較大差別,所以在發文數量、“他引”數據等方面的差異十分鮮明,社會類、政治類、經濟類的學科要明顯高於文學類、歷史類、藝術類學科,那麼在具體遴選上就必然存在差異。而且學術成果的引文數量與被引成果的質量之間並不能直接劃等號,對學術成果的評價不能單純依靠引文數量就予以定性。此外,“南大核心”的評選原則一般是新創刊的期刊不參與評選,三到五年後再評,這為新刊進入“南大核心”行列提供了操作空間,即通過建立在人情、互惠層面的引用,逐漸達到遴選的標準。可以說,“南大核心”主要重視已刊論文的引用率,基本上屬於“定量/量化”評價的方式。除了定量評價之外,定性評價在學術評價體系中亦佔有重要地位。而定性評價雖然綜合考慮到相關專家的意見,但其對學術成果質量的關注與分析仍不能說十分完善。那麼,科研管理部門用“南大核心”直接評價學術成果的簡單方法就顯出局限性,同時也是“不作為”的表現,其中忽略的是學術成果對於問題的發現與解決能力,以及對於知識拓展和學術進步的實際貢獻。

在“三大核心期刊”之中,還有一項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AMI 綜合評價報告》(又稱“A 刊”)。該評價體系堅持內容評價與分類評價、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強調同行專家在期刊評價中的重要作用^⑪,強調期刊的特色化發展方向、自身管理建設以及支持優秀學術人才成長所發揮的作用,所以在當前的期刊界和學術界也有着較大的權威性和影響力。2022 年版的指標在吸引力、管理力和影響力 3 個一級指標之下,又細分為 13 個二級指標、31 個三級指標,同時設置一票否決指標、計分指標、加分指標、扣分指標和觀察指標(方向性指標)五種類型的指標,各個指標的統

計時間和數據來源存在差異,主要側重人文學科期刊、綜合期刊與社會科學期刊。但從認可度來看,國內高校和學術界對該評價體系的接受度似乎比不上“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

“三大核心期刊”是當前通行的三種學術評價,但從深層次上說,學術評價如何能夠真正貼近和反映學術研究的實際狀況?如何將學術評價從單一維度評價轉變為有專家所倡導的“複合型”評價?能否在學術評價機制上以一些學者提出的內在“行規”取代某些簡單的“指標”?究竟是量化評價還是定性評價更合理、重要?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深入的理論辨析和大量的實踐印證。正如仲偉民和溫方方所指出的:“在目前的條件下,學術評價以定量為主,輔以定性,可能是最合理的評價方式。”^⑫這就是說,除了上述“三大核心期刊”的定量評價之外,學術評價還需要藉助定性評價的方式,以探索更加科學與有效的學術評價。

當前,在定性評價的過程中,“三大文摘”(《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以及“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簡稱“人大複印資料”)等載體提供了基礎性的評價依據。其中《新華文摘》將轉載重點放在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等研究領域的最新動態和研究成果,尤其傾向於對前沿性、創新性的理論知識及實踐方式的摘錄。因其包含着綜合性與廣泛性的特徵,所以被作為最權威的文摘類期刊,也深度參與了當前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學術評價,通常作為職稱評定、科研獎勵的重要依據。《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關注哲學社會科學重要研究成果,注重成果的思想性、前瞻性、批判性及創新性。《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則主要從學科發展角度關注高校文科領域的學術成果。“人大複印資料”的轉載量(率)亦得到學術界和期刊界的認可,被認為是定性評價的重要構成部分。它將學科分為九大類^⑬,通過結合專家學者的意見,在大量學術期刊中進行整理加工、分類編輯,保證學術信息產品質量。“學術評價”板塊每年會對外公布重要轉載來源期刊、機構、作者,為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提供評價研究和管理服務。

無論是“三大核心期刊”的定量評價,還是文摘類期刊的定性評價,其中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這意味着學術評價不能簡單地依靠某種某項指標或某種評價體系來完成,而應在定量評價和定性評價相結合的基礎上,將重心放在學術成果的研究本體上,放在其對社會問題、現實問題的精確發現與實際解決上,不斷促使評價維度由“單一”走向“複合”。此外,學術期刊的評價除了期刊內容評價之外,諸如編校質量、印刷質量、編輯團隊建設、作者隊伍建設等因素也應納入到評價範圍之中,不斷增強評價標準的多元性與有效性。蔣重躍批評了當前學術評價中的“學術缺位”問題,認為不能用影響力和傳播力的本質來遮蔽學術的本質,“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學術發表,或者是學術評價,目前更應該關心的是它們的學術本質,而為了實現這個本質,就一定要超越學科畛域,追求知識創新。這是時代發展提出的必然要求。”^⑭沈固朝也指出了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的錯位問題:“期刊評價主要是針對載體的形式評價,學術評價主要是針對內容的價值評價,目的和性質不一,也就很難論及引領作用。對內容的評價至少要求評價者能讀懂論文,對研究難度、論證水平等進行綜合分析,在此基礎上對科學性、價值性、前沿性、學術貢獻、學術特色等作出評判,最終得出對刊物整體水平的估測。”^⑮

因此,學術評價儘管對學術期刊有着深刻的導向作用,但因部分評價指標的缺失、標準的混雜以及思維意識的固化,在評價過程中也會使學術期刊走向歧途,無法以科學的、嚴謹的、負責的態度對待學術研究成果,產生人情化、圈子化、互惠化的弊病,久而久之必然會造成不良的學術之風。學術評價中唯有堅守學術本體,才能促進良好學術生態的建設和發展。

三、學術期刊參與學術評價的方式

置於上述情境中,學術期刊應當主動出擊,掌握在包括學術評價在內的各項學術活動中的主動權。在筆者看來,學術期刊作為重要的學術平台和學術紐帶,通過組織、推動學術研究,發布、傳播學術成果,事實上在策劃選題、遴選稿件過程中也參與了學術評價。“三大文摘”以及“人大複印資料”同樣如此。那麼,面對日漸多樣的學術評價體系,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如何在堅守辦刊立場的基礎上,有效地參與到學術評價之中,成為其當下期刊界與學術界所應思考的核心問題。在由單一評價向複合型評價轉變時,學術期刊應不斷激起漸趨沉睡的主體性。而主體性建構的關鍵即在評價體系中保持主動性,重視多維度、多視野評價的養成。

學術期刊在策劃選題、遴選稿件以及確立自身特色的過程中,期刊的編者(編輯)無疑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張耀銘指出,一份優秀社科學術期刊的建設,“最重要的是期刊的編者肩負使命、銘記職責,透過內容的價值營造和學術語言的表達,體現出的一種特色、一種傳統、一種境界、一種情懷,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學術創新力、學術公信力和社會影響力。”^⑩這一方面強調了編者對於期刊建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實也向編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其本身不僅要做好稿件的評審、遴選工作,而且要在更高層面上保持對期刊的使命感與責任感。郭慶華把期刊編輯視為一種特殊的“工種”,認為“其行為與作用有着基本清晰的職業邊界,編輯主體是依賴於合乎職業規定和需求的力量的投入及其效用而存在的。這種職業化的編輯主體力量,就是編輯力。”^⑪她在此提出的“編輯力”概念主要由“學術”與“技術”兩個層面構成,學術期刊正是在學術與技術協同共進的編輯力中最終形成。所以,編輯在學術期刊發展過程中發揮着無可替代的作用,不僅要有自覺的審閱、編校稿件意識,而且還應具備專業理論知識的敏感性,能夠深入洞察一篇文章的核心思想、論述思維以及論題價值等內容,充分發掘出一些有價值(特別是能產生社會價值)的論文,在提升學術期刊發文質量的同時,增進學術期刊對於學術評價的參與度,不斷改變“以刊評文”的發展現狀。從期刊來稿的角度說,許多綜合學術期刊不再僅僅依靠自然來稿,而是通過與相關專業的專家學者的主動溝通與交流,積極把握學術熱點和動態,在此基礎上進行策劃選題,充分發揮其對學術的規範與引導功能。正如劉曙光所指出的,學術期刊的責任在於“通過引入並推進學術規範和學術批評來建立學術誠信,培養良好學風;通過預見和洞察、通過策劃和組織來引導學術潮流,優化學術生態”^⑫。

學術期刊正是通過開設專欄、策劃選題等形式,積極參與學科布局,制定學科研究規範。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開設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專欄即具有研究視野的開闊性與研究意識的前瞻性,同時也與政治建設、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等社會問題緊密連結起來。無論是古典文化傳統之當代意義的挖掘,還是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學話語的建構,抑或是對網絡文學等新興文化形態的探討,其中融構的是富於啟示性的話語表達與考辨性的思維闡發,不僅能夠引領當前學術研究的動態方向,而且也呈現出對學術評價的自覺引導。在學術期刊的策劃選題上,2024年的選題主要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傳統和創新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大數據、人工智能研究”等,這也構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建設的基本維度與重要方向。另外,一些綜合學術期刊每年會公布重點選題,這其實是在保持辦刊特色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學術評價的重要方式。比如《北京社會科學》在2024年將主要圍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文學、歷史、哲學、法學、教育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組織策劃選題,在其公布的29個選題方向中,第5

條“地方(北京)經驗與文學書寫”、第7條“北京地區的歷史、文化研究”、第8條“與京津冀地區有關的歷史、文化研究”和第13條“北京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研究”、第14條“現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設研究”,均能夠深刻地傳遞出立足於北京地區文化建設、文學發展以及經濟建設的研究特色,同時也反映出選題意識與時代發展建設需求之間的有機關聯,能夠促進當下學術評價體系的建構。而《清華大學學報》、《澳門理工學報》等期刊參與學術評價的方式更為特別,它們長期推出關於學術評價、學術期刊發展等問題的研討文章,論及學術評價的功能與性質、學術期刊的理念與責任,以及學術期刊與社會、文化、科技、傳播的關係等諸多方面,為期刊界、學術界貢獻了很多難能可貴的理論智慧和富有建設性的意見。

學術期刊應注重對學術成果的內容評價,這是學術評價的主體內核。沈固朝就將“內容”作為學術評價的主體,指出該評價“要求評價者(專業編輯和同行評審者)能夠讀懂論文的內容,能夠從研究問題難易程度、專業知識掌握程度、論證水平、觀點、方法和資料駕馭水平等等尺度進行論文的綜合質量分析,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性、價值性、前沿性、學術貢獻、學術特色、風格、專長的比較,最終得出刊物整體的創新性、研究的多樣性、爭鳴性、價值性的判斷。”^⑩此種評價顯然不是引文數據、轉載量(率)等定量評價能夠勝任,其中需要的是期刊編輯和同行評議專家對論文內容的深刻理解,據此形成專業性與前瞻性的認識,而非簡單依靠學術平台推送的數據。當然,定性評價本身也有其局限性,它“以專家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為基礎,缺乏相關制度建設,缺乏程序的公開公正,評價結果容易受評議專家自身學識的局限,存在着主觀偏見、利益驅使等諸多不確定性,缺乏客觀性與可比性。”^⑪這就要求同行評議專家在定性評價過程中要堅守學術性與科學性,不能加入人情、利益等因素,始終追求客觀公正的評價。學術期刊在對待學術成果時,應該從成果內容這一核心出發,重點挖掘其中所包含的學術創新性,呈現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學術期刊在參與學術評價過程中,還應注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分類評價。眾所周知,人文科學學科(文學、歷史學、哲學、語言學等)以基礎研究為主體,其中的一些冷門學科與社會現實有所疏離,自然在被引率上相對較低;社會科學學科(政治性、經濟學、法學、教育學、管理學等)更加注重應用性與實際效應,與社會現實問題關係密切,比較容易製造學術熱點,在引用率、轉載率上相對較高,影響因子也隨之增長。倘若完全按照同一個標準來對相差較大的兩個學科進行評價,勢必會造成認知的機械性與固定性,也會損害人文科學學科的發展積極性。諸如引用率、轉載率、影響因子等要素所提供的更多的是統計學意義上的價值,不能完全以此作為評價期刊質量高低的標準,更不能以此來評價學術期刊及研究成果的學術貢獻。陳穎就看到了以影響因子為主要指標的期刊評價對學科發展帶來的危害,指出“許多人文社會科學綜合類學術期刊,為了追求刊物影響因子,保持或擠進核心期刊行列,在論文取舍上,採取揚社會科學學科,抑人文學科的編輯方針,偏重刊用影響因子較高的社會科學論文,少刊甚至不刊人文學科論文,變相製造學術不公。”^⑫據此來說,我們今天不斷倡導對基礎學科以及冷門絕學的保護,其中一個比較關鍵的因素就是要改變以往不加分類地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進行評價,甚至完全依照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標準來要求人文科學的評價方式,因為這種評價違背了科學規律,不僅無法促進學術期刊的良性健康發展,而且也深刻地阻礙了行之有效的學術評價標準的建立,對於學術研究同樣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

在信息技術不斷更迭的今天,學術期刊參與學術評價的方式非常多樣,總體上應該由“被動迎合”轉向“主動參與”,不斷確立自我的主體性。當然,學術評價及評價機構本身也有主體性,而若真正建立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之間的“互生”關係,就不能將兩者的主體性視為獨立的、平行的概

念,而應在選題方向、內容評價、分類評價等層面實現資源互享與信息互通,特別是通過深度對話的方式與“三大核心”、“三大文摘”、“人大複印資料”等評價體系在學術理解上保持同步,這樣才既能夠葆有學術評價的指導地位,又能充分發揮學術期刊對於學術研究的推動力,逐步形成聚合融通的“雙重主體性”。還需強調的是,學術期刊在參與學術評價的過程中也不能將自我的價值擴大化,應當警惕由評價話語形成的“權威機制”,即不能從主體意識層面把自我視為學術話語的中心,完全凌駕於學術評價之上,而應作為一種學術交流的平台,回歸到學術期刊的初心,既為學術研究者提供學術爭鳴與對話的載體,又為學術評價創造一種良性空間,構建良好的、健康的學術共同體。

四、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共同體構建

學術評價通過多種形式影響與引導學術期刊的發展,學術期刊參與學術評價的方式亦十分多樣,二者之間的關係表現出互動性與對話性,也只有在互動與對話中才能夠形成良性的發展態勢。按照英國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的理解,學術(科學)共同體包含共同信念、共同價值、共同規範三個層面,其本身並沒有外部力量與利益的驅使,主要在於個人興趣和科學精神的激勵。^②同樣,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與學術創新也不是依靠所謂的權威期刊、核心期刊而形成,它必然建立在擁有共同精神意志與學術理念的學術共同體之上。正是依靠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研究之間的積極互動,良好的學術共同體才得以構建出來。

當前高校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科所實行的評價機制無疑存在着數量化、形式化、行政化的弊端,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不合理的現狀,充分激發研究者的思考與探索的積極性,使其由重數量、重數據、重引用的不良競爭,轉變為追求學術質量、探求學術本質的本體意識,真正挖掘自我潛能、實現學術價值,成為高校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科發展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為此,我們在建立學術評價機制的過程中,要重視學術共同體的關鍵作用及其所蘊藏的價值尺度,不斷促進良好學術風氣與學術生態的持續發展。許紀霖指出:“比較起同質化的外在評估體系,學術共同體的內在評價體系按照不同學科的性質特點,可以是多元的,其價值評判尺度也因專業的不同而有所差異。”^③儘管較之行政化的外在評估來說,形成基於學科差異的多元評價機制困難重重,需要學術共同體的長期互動及知識累積,但如果一旦形成,便會成為行之有效的“行規”,為學術研究提供長足動力。原祖傑曾以現代期刊史上的《學衡》雜誌作為研究核心,分析了辦刊人的學術傾向對於學術期刊特色的決定作用,表明學術期刊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需要依靠的是其所依附的學術共同體。“學術期刊只有根植於一個全球化的、獨立、活躍、共享的學術共同體,才能使作為作者與讀者的廣大學者產生歸依感,也只有在這樣健康的學術生態之下,學術期刊才能擔當起引領學術的使命。”^④學術期刊倘若由於過多地受制於外在因素而脫離學術共同體,不僅會影響學術生態的總體建設,而且也會極大地削弱學術期刊對於學術研究的引領作用。

學術評價同樣也需要在良好學術共同體的維繫之下才能發揮價值。在當前,追求量化的、行政化的學術評價機制存在很大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是丟失了學術研究的責任感與主體性,甚至將學術研究作為一種獲取資源、謀取利益的工具,這是利益驅使下形成的“共同體”,其中存在着諸多局限性。有學者把此種“共同體”視為“學術單位體”^⑤,認為它對於學術評價與學術生態產生阻礙甚至造成摧殘。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必然要拋置“學術單位體”,在學術交流中自然形成,不僅能夠承擔起學術研究的責任,而且在學術評價上也秉持着獨立的、飽含主體性的精神姿態,亦不會因個體或集體的利益而產生學術壟斷或學術倦怠,能夠確保學術評價效力的自覺發揮。無論是學術

期刊的良性發展,還是學術評價的持續改善,都能夠有力地促進學術共同體的構建。反過來說,良好學術共同體的構建也能夠通過確立一種長效機制,促進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的長足發展,二者之間是一種良性互生的關係,絕非人為製造的對立。正如馮琳所指出的:“學術共同體由志同道合、具有推動學術事業發展良好意願的學者群體構成。他們基於共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和研究興趣,遵守共同的學術及行為規範,在相互交流和影響中推動學術共同體的良性發展。”^⑤

從學科發展的角度說,良好學術共同體應在堅持多學科發展的基礎上,致力於保護基礎學科研究。多學科發展仍舊是綜合學術期刊的本位和初心,對基礎學科的扶持則是其發揮學術載體與交流功能的重要表現。在基礎學科建設方面,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能夠通過研究成果的遴選,保證基礎學科成果的持續產出,而非淹沒於熱門學科的研究潮流之內。對於冷門的、偏僻的學科領域來說,其自身的發展更加不能離開學術期刊和學術評價的支持,這從深層次上指向的是學術共同體的關鍵作用。比如國家社科基金自 2018 年起設立的“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將研究領域放在對國家戰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研究投入不足的基礎學科、對文化傳承具有重要價值而亟需搶救的瀕危學科、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構建具有重要作用而有待加強的特色學科等,這是通過學術評價的方式保護絕學、冷門學科的表現,能夠促進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的發展。“南大核心”2021—2022 版專門推出“冷門絕學”期刊,包括《出土文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辦)、《敦煌研究》(敦煌研究院主辦)、《歷史地理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地理學會主辦)、《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主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陝西師範大學主辦)五種來源期刊,以及《敦煌學輯刊》(蘭州大學主辦)、《海交史研究》(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主辦)兩種擴展期刊,積極回應了國家關於保護冷門絕學的號召。學術期刊應有意識地加強基礎學科(尤其是冷門、偏僻學科)的保護,構建出良好的學術共同體。在這方面,給人印象深刻的是,《澳門理工學報》在“中西文化”欄目中持續推出宗教研究,對較為冷僻的宗教文獻整理、史實爬梳和問題剖析用力頗深,逐漸累積了可觀的成果,實乃功莫大焉。還有,《首都師範大學學報》堅持開設相對冷門的“古典文明研究”、“古史新視野”等欄目,默默地推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良好學術共同體絕非是追逐短期效益、利益的組織或團體,必然要承擔起學術責任,不能忽視瀕危且有價值的學科。

學術共同體在跨學科研究的導向上亦能夠產生積極作用,這之中離不開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的參與。“學術共同體是學術界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方式,學術期刊必須符合學術共同體的基本屬性,學術發表是屬於專業領域的專業性活動,只有堅持專業人士做專業事情,才能把學術期刊辦好。”^⑥《首都師範大學學報》所開設的“美學美育研究”、“信用研究”等欄目,儘管聚焦點在於美學美育研究、信用研究等學科問題,但所刊發的學術成果融合的是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文化學等學科視野;“再解讀”欄目意在通過重讀文學經典作家作品,與已有研究形成歷史性的對話,立足當下語境去重新解讀經典作品的特質,特別是呈現經典特質對於當下時代發展的指導作用,表現出綜合性的研究視野。

可以說,以學術期刊和學術評價為核心建立起的學術共同體在此扮演着“指揮員”的角色,不斷引導學術研究的視野與方向,使其保持學術研究的科學性與主體性。在這一過程中,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是建設學術共同體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兩個主體,以積極的、富於啟發性的載體意識與評價行為促使良好學術共同體的形成。而良好的學術共同體則通過引導建立合理的、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反過來促進學術期刊的良性發展,使其不至於在利益面前迷失自我,不斷維繫學術生態系統

的運行結構和生命機理。

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之間存在着一種飽含主體性的對話空間,儘管當前紛繁多樣的學術評價對學術期刊產生引導作用,但這種引導不能在實踐層面扭曲為一種強制性的“權力話語”,影響乃至束縛學術期刊的整體發展。學術評價應當拋置外在的、行政化、數量化的因素,在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基礎上,形成以學術成果內容質量為本體的評價機制,合理引導學術期刊的發展方向。對於學術期刊來說,其本身也不應被動接受學術評價(尤其是一些帶有明顯缺陷的、利益引導式的學術評價),而是要通過主動參與的方式以及融合性的視野不斷完善自身的評價體系,同時也對學術評價產生作用力,將二者的關係由被動依附轉為相互敞開。

在當前,學術期刊由於過多地迎合學術評價,它作為學術成果交流平台的功能被極度縮減,甚至完全丟失,這顯然不利於學術期刊的長足發展,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恢復與重構。學術期刊還應擺脫單一量化評價的束縛,在保持辦刊特色的基礎上,通過與各種學術體系、評價機制之間的互動,促進良好學術共同體的建立。唯有學術期刊、學術評價與學術共同體之間形成良性互生的發展態勢,以高校學報為代表的綜合學術期刊才能在多元的時代語境中找準定位,不斷引領學術研究的潮流。

①參見許紀霖:《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尺度》,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朱劍:《高校綜合性學報向何處去?》,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劉京希:《綜合性學術期刊所面對的挑戰及其回應》,石家莊:《河北學刊》,2022年第5期。

②《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刊發了主題為“學術評價與綜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發展”的5篇筆談。其中張耀銘針對當前學術評價中出現的功利主義、“以刊評文”以及“核心期刊”被捧上神壇等異化問題,提出應該重新建造學術評價體系,包括重建學術同行評議、重建質量導向和回應社會關切、改革和完善學術評價體系等內容。朱劍立足於談論高校學報的發展去向問題,提出創辦特色專欄、通過刊際聯合創建數字化聚合平台等有力舉措。王澤龍提出學報與學科之間應形成良性互動,刊物學術平台要做到“高大上、少而精,形成品牌、名牌”。蔣重躍指出學術本質的實現要不斷超越學科畛域,追求知識創新,這同時是時代發展提出的必然要求。原祖傑看到學術評價中存在的量化評價與期刊分級的弊端,提出要重視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之間的有機關聯,不能相互掣肘。

③《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刊發了主題為

“社科期刊發展與學術共同體構建”的3篇筆談。其中仲偉民與溫方方梳理了目前社科期刊面臨的矛盾和難題,剖析了其發展過程中的外部壓力,並提出內部應對的策略與方案。鄒曉東深入闡發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高品質的學術期刊就是要堅守初心、引領創新”,重點論述了“學者辦刊”的合理性,提出以此為基礎提升期刊質量的路徑。鄧曦澤從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提取“問題+方法+效用”結構,在探討學術論文寫作“章法”的同時,反思了當代學術生態。

④宋月紅、真漫亞:《蔡元培與〈北京大學月刊〉——兼論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學術革新》,北京:《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⑤參見朱劍:《高校綜合性學報向何處去?》,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

⑥張耀銘:《中國學術期刊的發展現狀與需要解決的問題》,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⑦劉京希:《綜合性學術期刊所面對的挑戰及其回應》,石家莊:《河北學刊》,2022年第5期。

⑧王澤龍:《人文社科綜合期刊評價與自我定位》,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

⑨姜曉輝:《核心期刊的評價功能與作用》,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1期。

⑩葉繼元、袁曦臨：《引文數據庫來源期刊（核心期刊）評選的得失與出路》，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1期。

⑪從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發布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綜合評價指標體系（2022版）》來看，在“吸引力”指標（一級指標）中，專家同行評議比重佔80%；“影響力”指標（一級指標）中的“學術影響力”佔70%。後者雖然並未直接反映專家意見，但影響因子、論文轉載量等因素也蘊含着專家的影響。所以，這兩個評價指標均能夠呈現同行專家意見的重要性，反映出A刊評價中對於專家意見的重視。

⑫仲偉民、溫方方：《目前社科期刊面對的十個矛盾與難題——社科期刊的外部壓力與內部應對》，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

⑬主要分為政治學和社會學類、法律類、哲學類、經濟學和經濟管理類、文學與藝術類、教育類、歷史類、文化信息傳播類和其它類。

⑭蔣重躍：《超越學科畛域 砥止知識創新——從“學術本質”的範疇看學術期刊和學術評價》，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

⑮沈固朝：《學術期刊評價十問》，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23年第5期。

⑯張耀銘：《學術期刊肩負的使命和職責》，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3期。

⑰郭慶華：《“學術”真的重於“技術”嗎？——也論學術期刊編輯力》，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

⑱劉曙光：《高校社科學報功能定位的反思》，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1年第4期。

⑲沈固朝：《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中的CSSCI》，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7年第3期。

⑳鍾秋波：《社科學術期刊評價：回顧、反思與構想》，

成都：《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

㉑陳穎：《新時代高品質學術期刊建設與編輯的初心使命》，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23年第6期。

㉒轉引自高自龍：《耦合與借鑑：“核心期刊”之於學術評價的再思考》，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年第1期；原祖傑：《學術評價的困境與學術期刊的使命》，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

㉓許紀霖：《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尺度》，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㉔原祖傑：《學術期刊何以引領學術——兼論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之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4年第1期。

㉕張應強指出：“學術單位體是學術領域的小團體、小集體，是圍繞單位的學術利益或者其他利益，通過有形或無形的組織而形成的小團體。其典型特徵是封閉性和利益性，即以單位的利益而不是學術的發展作為紐帶來連接學者、集合學者，排斥正常的學術競爭，形成學術利益的壟斷”（《促進學術共同體的建立，營造良好的學術評價環境》，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㉖馮琳：《新時代中國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構建》，石家莊：《河北學刊》，2021年第3期。

㉗張蕾、何雲峰：《合理引入同行評議以促進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南寧：《出版廣角》，2022年第6期。

作者簡介：張桃洲，《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北京 100049

[責任編輯 劉澤生]